

抗議

錄 目 期 二 第

- 千鈞一髮之際(社論)
舉一個例(特載)
醞釀中的德意日同盟
精神動員及其他(中)
友乎敵乎
第三條路(中)
長期抗戰與製造無產階級
青年思想談什
游擊隊在鄉間
重慶大公報所載之推背圖

記 著 晏 扶 石 英 周 文 余 駒 家 葉 紀 懷 仲 平 條 林 機 傑 汪 精 衛 劉 錄 譯 南 鎮

版出日一十月四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千鈞一髮之際

鎮南

社論

捷克亡國時節，集體安全的呼聲轟動了整個世界；尤其是陣線論者在其紛紅色的夢中，滿以為這一來所有民治國家必然會「集體」起來對付全能國了。詎知夢境終是夢境，倫敦巴黎之間的一番熱鬧，只落得一場空歡喜。

殊不知現在的所謂民治國家，根本不會團結，即使形式一致，也止於爲了她們本身的切膚利害，與被侵略的弱小國家是毫無裨益；非惟無益，抑且助長侵略國的方便，反令被侵略國受害。可惜這種論斷，在陣線論者始終不肯接納，他們至死還是抱定惟有集體安全才是和平的保障。他們對於中日事件之解決，惟有希望國際調停（共產黨更不希望它有解决），以爲惟有國際調停中國才有面子，中國方不致屈服於日本。現在，的確，國際調停的局面將要形成了，萬一果成事實，中國能不能得着理想中的好處？當此一髮千鈞之際，我們誠不能不大聲疾呼！

據重慶三月二十八日路透電稱：「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之赴滬訪晤英國駐華大使寇爾爵士，寇爾爵士於與克萊琪會

晤之後，行將前往重慶，及蘇聯駐華大使盧幹茲之前往莫斯科，均與遠東局勢未來之重要發展有關；」又二十七日大美晚報所載本埠消息：「義大利駐華大使屈來尼氏，曾數度與日僑當局往返週旋，引起各方之譴異；該大使業於今日下午乘義艦離滬；是否前往南京或天津，抑係前往香港，則因義使館方面並無消息發表，尚不可知」云云。這些線索，并非蛛絲馬跡，乃是正正式式的和平運動之姿態，而且重慶方面已加以確定的說明了。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就是若果國際調停正式實現，中國將得着什麼結果？

帝國主義者的集團對於弱小國家會不會施恩賜惠？姑不置議。今僅就參與調解活動的英義兩個國家而言。（事實上，在日本方面非有德意兩國加入不可。）這兩個國家照陣線論者看來是水火不相容的，由她們所合成的集團來調解中日糾紛，能不能收獲援助弱小制裁侵略的結果？事理也很簡明了。再就所謂站在民治陣線的英國來講，她是無意與日本爲難的；雖然最近英日兩國已處於不協調的局境，可是英國佔有甚大勢力的保守派，至今仍不忘情於英日同盟的舊夢。這種內在的意志，可以舉一事來證明它：即此次英國對華借款

時，英當局惟恐引起日本的反感，故一再聲明「借款目的只在維護英國在華金融權益，對於日本並無不友好之處」，試想由英國領導的調解勢力，是合於中國需要的嗎？

美國對於遠東的關係，不亞於英國，若果調解活動正式出現，美國自必被邀加入，而在中國方面似乎非有美國加入不可。可是美國加入調解，對於中國能不能勝英國一籌，也無人敢武斷。我們也不妨舉一事來證明美國的立場：美國最近因歐洲事變而促成中立法修改運動，修改後的中立法內容如何呢？試看畢德門的方案：僅僅規定交戰國向美國購買軍火的手續，即「現款交易」與「自己運輸」，對於侵略被侵略之分仍然擱置不問。這種修改，不過將政治性的法規變為普通商業法規而已。而且照這種改正法，對被侵略國毫無救濟，

對侵略國毫無不便。美國若是以公正紳士為己任，根本不應有此怪劇。從而美國對於調處中日糾紛的最後事實，也不難想像得之了。

中國當局是否已鑒及此，不得深知。是否能及時猛悟，而採納汪精衛先生的和平主張？更不得而知。另據三月二十九日香港電訊：「孫科業於廿六日抵莫斯科，即與蘇聯政府訂立新軍事協定，完畢簽字；本協定成立後，中國政府接受蘇聯所要求條件究竟如何，尙難明瞭」云云；此消息係同盟社發出，容有不盡不實之處；但孫氏之前往莫斯科，與蘇俄駐華大使之忽爾歸國，則是事實。在這些事實之中，我們不難

想像到莫斯科的活動，至少與最近英意兩國外交使節所從事的和平活動有關。究竟中國政府是預備把和平問題取決於蘇俄呢？還是恐怕和平失敗索性要求蘇俄支持抗戰呢？我們惟有誠惶誠恐，不敢向此道追置一詞！

綜上所說，對於目前中日問題之形勢已可作一結論：第一，中國若把事件交給國際集團解決，必無好果；第二，國際調解的形勢將要形成了，就是中國的命運將要聽憑他人主宰了；第三，無論調解能否成功，蘇俄必從中搗亂，使中國永無發奮為雄之日。中國處此際會，環境之險惡，命運之危殆，實較揭櫻抗戰時尤為迫切，尤為嚴重。我們不能不大聲疾呼：

「中國的生死存亡已經到了最後關頭」！

「中國已經到了可以乘機創造新的生命或永遠被他人宰割的最後關頭」！

汪先生過去被打了一槍，最近又險遭不測，而他仍然在大聲疾呼，三月二十七日為曾仲鳴先生殉國事，再度把他的和平主張昭告中外；並謂「我這篇文章發表之後，說不定在什麼時候，我會繼曾仲鳴先生而死」！汪先生連自身的生死也不顧慮了，他為的什麼呢？他是為生死存亡臨到最後關頭的國家！每個中國同胞呵！我們要把握着這千鈞一髮的關頭，來爭取自主的和平。跟着汪先生的努力，把垂危的國家拯救出來！

舉一例——特載——

汪精衛

曾仲鳴先生彌留的時候，有鄭重而簡單的兩句話：「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沒有什麼不放心的。」曾先生對於國事的主張，與我相同；因為主張相同，常在一處，所以此次不免於死。曾先生之死：為國事而死，為對於國事的主張而死！他臨死的時候，因為對於國事尚有主張相同的我在，引為放心；我一息尚存，為着安慰我臨死的朋友，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他，他所念念不忘我的朋友，我已經應該更盡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張的實現！何況這主張的實現，是國家民族生存所繫我因為發表艷電，被目為主和。主和是我對國事的主張了！這是我一人的主張麼？不是！是最最高機關經過討論而共同決定的主張；這話有證據沒有呢？證據何止千百！今且舉一個例罷：

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

時間 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時

地點 漢口中央銀行

出席 于右任 居正 孔祥熙 何應欽

列席 陳果夫 陳布雷 徐堪 徐謨 翁文灝 邵力子 陳立夫 董顯光

主席 汪副主席

秘書長 張羣

秘書主任 曾仲鳴

徐次長謨報告 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於上月二十八號接得德國政府訓令，來見孔院長，二十九號下午又見王部長，據稱彼奉政府訓令云：德國駐日大使在東京會與日本陸軍外務兩大臣談話，探詢日本是否想結束現在局勢？並問日本政府如欲結束現在局勢，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方能結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條件數項，囑德國轉達於中國當局。其條件為：（一）內蒙自治；（二）華北不駐兵區域須擴大，但華北行政權，仍全部屬於中央，惟希望將來勿派仇日之人物為華北之最高首領，現在能結束便如此做法，若將來華北有政權之成立，應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尚無在華北設立新政權之意。

；至於目前正在談判中之鑛產開發，仍繼續辦理；（三）上海停戰區域須擴大，至於如何擴大，日方未提及，但行政權仍舊；（四）對於排日問題，此問題希望照去年張羣部長與川樾所表示之態度做去，詳細辦法係技術問題；（五）防共問題，日方希望對此問題有相當辦法；（六）關稅改善問題；（七）中國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國之權利云云。

陶大使見孔院長王部長後，表示希望可以往見蔣委員長，遂即去電請示，蔣委員長立即覆請陶大使前往一談。本人乃於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與陶大使私人談話，陶大使謂：「中國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精神，如今已到結束的時機；歐戰時，德國本有幾次好機會可以講和，但終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講和，直至維爾賽條約簽訂時，任人提出條件，德國不能不接受。」陶大使又引希德勒意見，希望中國考慮。並謂：在彼看，日本條件並不苛刻。十二月二日抵京，本人先見蔣委員長，蔣委員長對本人所述加以啟虛後，謂要與在京各高級將領一商。下午四時又去，在座者已有顧墨三、白健生、唐孟瀟、徐次辰。蔣委員長叫本人報告德大使來京的任務，本人報告前，各人就問有否旁的條件？有否限制我國軍備？本人答稱：據『德大使所說，只是現在所提出的條件，並無其他別的附件，如能答應便可停戰。』蔣委員長先問孟瀟的意見，唐未即答。又問健生有何意見，白謂『只是如此條件，那麼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數項條件。』蔣委員長又問次辰有何意見，徐答：『只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又問墨三，顧答：『可以答應。』再問孟瀟，唐亦稱：『贊同各人意見。』蔣委員長遂表示：（一）德之調停不應拒絕，並謂如此尚不算亡國條件；（二）華北政權要保存。

下午五時德大使來見蔣委員長，本人在旁任翻譯。德大使對蔣委員長所說，與在漢口對孔院長王部長所說者相同，但加一句謂：『如現在不答應，戰事再進行下去，將來之條件恐非如此。』蔣委員長表示：（一）對日不敢相信。日本對條約可撕破，說話可以不算數；但對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調停，因為相信德國及感謝德國調停之好意，可以將各項條件作為談判之基礎及範圍；但尚有兩點，須請陶大使報告德國政府：（一）關於我國與日談判中，德國要始終為調停者，就是說德國須任調人到底；（二）華北行政主權須維持到底，在此範圍內。可以將此條件作為談判之基礎；惟日本不可自視為戰勝國，以為此條件乃是袞的美敦書。德大使乃問：『可否加一句？』蔣委員長說：『可以！』德大使說：『在談判中，中國政府宜採取忍讓態度。』蔣委員長又謂：『在戰事如此緊急中，無法調停進行談判，希望德國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戰。』陶大使稱：『蔣委員長所提兩點，可以代為轉達；如德國願居中調停，而日本亦願者，可由希德勒元首提出，中日兩方先行停戰。』蔣委員長說：『如日本自視為戰勝國，並先作宣傳，以為中國已承認各項條

件，則不能再談判下去。」在歸途中，陶大使表示：以爲此次之談話有希望。在南京時，陶大使並對蔣委員長說：「此項條件並非哀的美敦書」。陶大使在船中，即去電東京及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覆；此後發展如何，尚不可知。

(附註一) 國防最高會議主席是蔣中正，副主席是汪兆銘，當時國府表面上由南京遷往重慶，實際上在武漢辦公，蔣主席因軍事指揮，留在南京，故國防會議由汪副主席代理主席。

(附註二) 外交部長王寵惠亦爲常務委員之一，是日因感冒請假，故由次長徐謹列席，且徐次長新偕德大使由南京回，亦有列席報告之必要。

(附註三) 徐次長報告中所說三人是顧就同，健生是白崇禧，孟滿是唐生智，次辰是徐永昌。

看了以上的報告，則我在年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國防最高會議函中所說：『猶憶去歲十二月初南京尙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劃，且較此爲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之爲和平談判之基礎，』其內容具如此。

此外還有證據沒有呢？何止千百！但其性質，尙未過去，爲國家利害計，有嚴守祕密之必要；而德大使調停之事則已成過去，故不妨舉出來作一個例。於此便會發生以下三個疑問：

第一，德大使當時所說，與近衛內閣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聲明相比較：德大使所說可以爲和平談判之基礎，何以近衛聲明不可以爲談判之基礎？

第二，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南京尙未陷落，已經認爲和平談判可以進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南京，濟南，徐州，開封，安慶，九江，廣州，武漢均已相繼陷落，長沙則尙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燒個精光，和平談判反不可進行？

第三，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國防最高會議諸人，無論在南京在武漢，主張均已相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又會主張不同？甚至必將主張不同的人，加以誣讐！不足，還要奪其生命，使之不能爲國効力！

對於以上三個疑問，我不欲答覆；但對於和戰大計，卻不能不爲國民進一言。

有人說道：『旣已主戰，則不應又主和』。此話不通！國家之目的，在於生存獨立，和戰不過是達此目的之手段，到不得不戰時則戰，到可以和時則和；和之可不可，視其條件而定；條件而妨及國家之生存獨立，則不可和，條件而不妨及國家之生存獨立，則可和；『如此尙不算是亡國條件』言猶在耳，試問主和有何不可？

有人說道：『中國抗戰而得到統一，如果主和，則統一之局又歸於分裂。』這話我絕對反對！從古到今，對國家肯負責任的人，只應該爲攘外而安內，絕不應該爲安內而攘外，對外戰爭，是何等事，郤以之爲對內統一之手段！中國是求國家生存

獨立而抗戰，不是求對內統一而抗戰；以抗戰為對內統一之手段，我絕對反對！何況今日之事，主和不會妨害統一，而不主和也不會不分裂。

有人說：『如果主和，共產黨立刻搗亂』。我以為共產黨是以搗亂為天性的，主戰也搗亂，主和也搗亂。共產黨的搗亂，如果於主和時表面化，比現時操縱把持挑撥離間的局面，只有較好沒有較壞。

有人說道：『國際並不盼望我們和。』我以為和與戰是國家民族生存所繫，應由我們自己決定，立於主動的地位，以運用外交，求國際形勢之有利於我，決不應該僥幸隨人；何況現時除第三國際外，並沒有其他國家反對我們和。

如上所述，已經明瞭。還有鄭重聲明的：甲午戰敗之後，有屈辱的講和；庚子戰敗之後，有屈辱的講和；這是說起就難過的，我不願這次的講和是如此，普法戰爭之後，法國有屈辱的講和，直至大戰而後吐氣，大戰後，德國有屈辱的講和，直至今日而後吐氣；這是說起來就得意的，我也不願這一次的講和是如此。因為這樣的循環報復，無有已時，決非長治久安之道。我所誠心誠意以求的，是東亞百年大計：我看透了並且斷定了中日兩國，明明白白有了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基礎，只要相與努力，必能將此基礎繼長增高起來，以奠定東亞百年長治久安之局。不然，則惟有兩敗俱傷，同歸於盡。這種看法，兩國人都有懷疑的，然而也都有確信的；尤其二十多月的苦戰，日本消耗，不為不大，中國犧牲，不為不重，兩敗俱傷同歸於盡的一條路，與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又一條路，明明白白，擺在面前；兩國有志之士，難道耽於一時之禍福毀譽，而徘徊瞻顧不敢顯然有所取舍嗎？來！來！和平建議之第一個犧牲者曾仲鳴先生，已將他自己的血照耀着我們往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之大路而前進！

末了，我還有幾句：當二月中旬，重慶曾派中央委員某君給我護照，俾我出國，我託他轉致幾句話：『其一，我不離重慶，豔電不能發出，然當此危難之時，離重慶已經很痛心的了，何況離國？我所以願意離國，是表明只要主張得蒙采納，個人不成問題。其二，聞得國民政府正在努力促成國際調停，這是可行的，然而至少國際調停與直接交涉同時並行；如此，則我以為在野之身，從旁協助，亦不為無補。其三，如果國民政府始終不下決心，任這局面僵下去，我雖離國，也會回來』。以上幾句話，定然是構成三月二十一日事變之原因；所可惜的，曾仲鳴先比我年青，比我學問好，比我的能力高卻先我而死！

我這篇文字發表之後，說不定在什麼時候，我會繼曾仲鳴先生而死！我所盼望的我死之後，國人能留心看看我這篇文章，明瞭我的主張是中國生存獨立之要道，同時也是東亞長治久安之要道；我的主張雖暫時不能為重慶方面所采納，終有一日為全國人民乃至中日兩人國民所采納，則我可以無憾！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醞釀中的德意日同盟

劉繆譯自三月二十七日字林西報

——得不償失日本將拒絕參加——

關於以德意日廣大的三角軍事同盟作為全歐國對擬議中的民主國聯合陣線的答覆一事，日本內閣勢將闢開其任何問話。簽訂反共公約是一事。在戰事爆發時明確的委身於與自己除反共外別無所同的歐洲二強藉為奧援，可以說是完全另一件事。凡為日本所或欲求者，至多是當德國進攻蘇俄時，日本可以進攻其西伯利亞，同時，假如日俄先發生戰爭，則德國可以幫助日本，攻擊蘇俄的西部國境，究竟怎樣纔能行使這個攻擊而使波蘭的安全和完整不受影響，那是難以想像的。

「精神」的對待詞是「物質」。任何事物皆可分析為精神與物質兩種形態來解說它。例如「軍事」，舉起槍桿瞄準發射，屬於物質，而發射時第一要鎮靜要對準敵人的腦袋，則屬於精神。做文章也須有條理的；然而在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及其實施辦法的「緒論」之中，有這樣一段：「前期抗戰，軍事與精神並重，而第二期，即後期之抗戰，則精神尤重於軍事。」文字技術的奇突姑不去管它，文理該有說處。「軍事」與「精神」居然用平行線來互較高低，真不知所說云何也。也不去管它！既然精神「尤」重於軍事，何故又來一個「軍事第一」呢？老百姓的頭腦是簡單的，因為「軍事」居於「第一」，便猜不出「精神」派在「第幾」了。

最後二字太遙遠無期了

連帶前面所引的一段文字，又想起一件事來：關於抗戰分期問題，現在究竟屬於三階段中的第二期呢？還是屬於前後期中的後期呢？本刊曾一再詳述；想不到我們的國家當局，本身也攬不清楚，例如上文所引的「而第二期，即後期之抗戰」云云，

精神動員及其他

林 機

精神重乎軍事重乎

同進攻蘇俄，也不容易，然此又爲日本方面責無旁貸者，假如她要在歐戰爆發時，站在羅馬柏林軸心方面的話。

在日本有一部份領袖相信，日本如果要安然脫出其目前所陷的困難，最好的方法，應求之於和英美相合作。雖然在此刻並沒有暗示此種合作的可能性的傾向。將來主張訂結此項同盟的一派若果失敗，有如某項通訊中所預測者，那一定是因日本的陸軍方面雖然想這樣做，但日本却無力負起此項同盟所賦予的重擔。我們爲審慎起見，不妨加以補充說，日本或將被拉入一個不做輸贏的賭局中，聊以自慰。反對參加此項同盟者的意見以爲日本在現狀之下絕對不能再處於虧本的一方，因爲他已經無本可虧了，這意見無疑的是很有力的。從手頭的各種報告中，我們知道在日本有一派很得勢的主張，以爲日本與其立刻出賣，不如留在市場上待善價而沽。而英美所能出的價錢要較無論那一個歐洲的獨裁者爲多；日本在財政上的迫切需要援助，是造成這個局面的最大因素。我們可以很堅決的證明，並且事實上是一天天明顯起來，日本對於中國的許多討價還價的活劇，最後完全是爲了要得到英美方的財政援助，因爲要是沒有此種援助的話，她在中國所投下的巨額資金，暫時是無法使其產生利潤的。和德意訂結軍事同盟的提議與此適相背馳，此項同盟對日本既無伸縮餘地，對其他參加的國家，也是如此，萬一歐戰發生，日本勢必要和德意取共同行動，由此行動而來的經濟上的影響對於他可以說一定是很壞的。他的海外貿易在目前中國事變中既遭受了重大的打擊，到這時必更將一落千丈，或者竟會全部崩潰。

直令人有丈二和尚之感。那也不去管它。無論分爲幾期，總必有「末了一期」的，而既然分期說明，則末了一期的大概性質也必有相當估計的。但是令人失望的，此末了一期究竟在什麼時候？約爲時若干？從來未見提過。共產黨是希望中日戰事永遠繼續下去的，所以毛澤東不肯規定第三階段的範圍原不足怪；而我們的國民黨，只在高喊「最後」的勝利終屬於我，亦不稍微指示「最後」的年代，難道不可憐老百姓望穿秋水嗎？因此便有人吹毛求疵，說是最後的勝利總屬於「俄」了。

國民黨內部更不該有鬥爭

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是本黨的重要態度。現在黨外是又有黨了，黨內有沒有派呢？也都不去管它。即有黨派，則在此抗戰救國之際，就該遵守各黨各派團結一致的信條做臨時的合作。可是據我們所知道的，本黨中的兩大派，即洗洗團與黃埔系，從最上的中央黨部起，到下面的各地各級黨部止，鬥爭之烈，較之國共鬥爭有過之無不及。這種可恥的事，我們覺得沒有面孔使老百姓知道。

究竟是實在還是空虛

抗戰以後，據說政府不斷地把全國各地的人材羅致到後方內地，以供發展××之用。××是否在發展？仍舊不去管他，總之，在內地人材想必很多，當非過譽；然而，最近新設的國立寧夏中學要物

從軍事上看來，我們不能不承認此項同盟足以威嚇西方的民主國家，但我們要記着，日本海軍的力量是因其所處的地方而異的，在自己的領海內，敵艦必須長途跋涉而來找它作戰，日本的海軍無疑的是強大的，但是要它離開其領海，那末愈離得遠，其力量也愈弱，固然在一個時期內，它可以轟炸英法的海軍，作為破壞該國海軍艦隊的手段，但其破壞力，也得大大把它打上一個折扣纔是。在漫天烽火的戰事中，日本海軍的唯一的真正安全處所，祇有在其自己的領海內，但在那裏是無法表現其足以左右歐洲戰局的力量的。此外，還有一種可能性，必須加以注意，那就是假如英國的四強合作計劃成功，蘇俄既亦包括在內，則日本的太平洋艦隊便不能不留一大部份來駐守在後方。固然，蘇俄在這一方面的海軍力目前是還不足道的，但是，無論如何，日本必須保留其相當的力量於這一方面，以維持其與大陸的通路。於此我們不能再補充一句：從此項擬議中的同盟想出來的羅馬柏林東京三角協定的利益，是想像上的居多，實際上的較少。而日本在將來歐戰爆發時，能夠為其歐洲的盟友所出的力，也必定要較擁護此項計劃的人所能想像的更限於隣近其本國的領土領海之處。這樣的同盟對於民主國家，當然也有不利的，但是我們也很少理由相信它真有足以左右歐洲局勢的力量，並且，萬一同盟軍被擊敗，這並不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日本及其兩個同盟國，就要遭逢着最後清算的日子了。很顯然的她不能站在虧本的一方，但據說她國內有幾個領袖却偏要叫她站到這一方去。

×
×
×
×
×

色一位教務主任兼理科教員，電請教育部物色，物色了多天，閩無一人，後來王部長通知奔走的人：「誰肯去，政府可以派飛機專送，用不着買票」！有飛機可乘，可紅透了上海教書匠的眼睛吧？然而結果仍是閩無一人！奇怪，人材用光了嗎？還是本來空無所有？我們很擔心這件事，同樣擔心其他許多問題！

南昌之失守

中國堅持抗戰下去，在軍事上有沒有切實的把握能夠在「最後」時節把日本軍隊打出去？再仍舊不去管他。但是，無論照共產黨所說的「現在是第二期」也好，照國民黨當局所說的「現在已入後期」也好，在此時期，中國方面的作戰形勢應該好轉，至少應該成為雙方不相上下的等勢了。既成等勢，（從何時開始等起？我們還未甚清楚），則進退應該是相對的了。然而我們只有在報紙上看見今日要反攻西北，明日要反攻東南，（大舉反攻廣州的呼聲喊得最久），結果是一塊豆腐干大的城磚也不會反攻回來。而日軍進攻南昌，（軍事上極關重要的據點），為時不過兩週，竟又失陷了。我們固然無顏面場自家的台，可是我們也沒有理由容許自家誇大。南昌之失，豈止暴露抗戰力之空虛？它更證明了所謂「二期、三期、最後勝利」這些話不盡是由衷之言。

友乎敵乎

仲平

中國人民對於抗戰救國所持的心，本來是純潔一致的，但自抗戰政權被共產黨利用把持之後，多數民衆純潔的心理上，不幸罩上一層可怕的惡氛。這種惡氛具有相當麻醉性，它會把自動的心理能力，麻醉到不能自主，使其僅有一種下意識的直覺在懸空浮蕩着，使真正的本來的抗戰救國的心理，變成被利用的口號，此種危機，凡是對於國家民族前途還存有一點良心的人，早已辨認明白了，可是還有不少被惡氛麻醉的人，始終浮蕩他們的直覺，甘心受共產黨的惡意利用。

在這一班人的直覺之中，他們以為：第一，現在的蘇俄是中國最知己的朋友，她會支持中國抗戰到底的；第二，現在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國民黨最知己的朋友，它會充實全國團結一致的精神的；第三，現在的中國紅軍，如外蒙紅

軍，新疆紅軍，八路軍等，是中國抗戰最有力的武裝，它終有一天會把在華日軍趕出國外的；在這幾種直覺之下，他們便無條件地認為共產黨的一言一動莫不與中國抗戰有利，所以也就無條件地跟着共產黨走。可是我們要痛切的指摘出來：這種直覺不僅不確實，而且是絕對的錯誤：蘇聯不但不肯幫助中國，而且無力幫助中國；中國共產黨不但不是中國國民黨的知己朋友，而且是存心吞滅中國國民黨的貪暴陰險的變相侵略者。總說一句，共產黨不但不幫助中國，而且想滅亡中國！

中國是個弱國，弱國是沒有外交的，她的外交雖不完全是被動，至少要受着國際關係的深刻影響，這是事實，平日如此，戰時尤其如此。如果中國在尙未得着國際的同情，便發動抗戰，則就

係而言，終必遭受壓迫；所以當抗戰未發動之先，政府當局會就種種方面活動，俾取得國際的諒解；及至抗戰發動之後，又就種種方面向國際呼籲請援，向國聯，向英美，向德意，甚至向蘇聯。可是所謂國際關係也者，乃是相對的，並非絕對的。任何國家，她第一是為本國打算，第二是為本國打算，第三還是為本國打算；如果與本國無關，或者關係並不深切，則同情云云，援助云云，根本不會發生；從反面說，別國對我同情，對我援助，其第一義並非為我而是為她自身。我們只能在各為本國利益的第一原則之下，覓取相關的利益，決不會有不顧自己的利益而完全為他國犧牲的國家。這種論斷，可以用任何國際事件的因果來證明它：阿比西尼亞事件也好，西班牙事件也好，最近捷克事件也好，甚至關島設防問題也好。現在我們根據這種論斷，先要檢討蘇聯對於中國抗戰所採政策的實際情形：

首先，我們——尤其是中國國民黨同志應該明白：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

是各自另有內容的兩種東西；別的兩種東西，可以捨短取長，互相調和，主義這東西，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如果對於目前中國共產黨已經聲稱自願服從三民主義的那種不合情理的假姿態，信以為真，簡直是缺乏常識；何況現在的蘇聯已經離開純主義的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而走向獨裁的反革命的政治奪取的路線了呢？就國共兩黨十餘年來鬥爭的史實而論，兩者正是冰炭不相容的冤家，是你死我活的仇敵，若謂現時因共同抗日而捐棄前嫌，在同為中國國民的立場來講，未始毫無可能，可是中國共產黨是受命於蘇聯的，蘇聯有如此閑情嗎？

七七事變爆發之初，蘇聯的態度，很為一般人所重視。「在那時，沒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使人相信俄國會聯合中國，或者為着中國打日本。中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一九二七年殺過史太林在中國的幾個政治代理人，並且放逐許多人，史太林及其同僚對他沒有好感。莫斯科表同情的是中國的共產黨；一九

三六年蔣介石仍舊積極的對中國共產黨開戰。俄國人像日本人一樣，常常期望得到最後勝利，造成東亞優越的地位。

不過莫斯科似乎不想急急的做這個競爭，史太林手邊的專家告訴史太林說：中國戰爭，中國大概會削弱日本的力量，不會增加她的力量的」，（註）。於是「蘇俄參謀部得到史太林的命令，繼續建立遠東紅軍（包括中國紅軍），不過不要把它參加實際戰爭（即正面對日戰爭）；」這是蘇聯援助中國抗戰的立場，這個立場是從西安事變確定起的。我們所以清楚了：蘇聯的所謂援助中國，究竟為的什麼？至於「中國和日本開戰，關於蘇聯援助中國的程度如何？近來有許多推測。其實，「蘇俄對中國很少援助」，但是給她的前哨（即第八路軍等中國紅軍）的援助却很多。事情就清楚了：

，幫助解決遠東糾紛之中心的日俄東亞爭霸這個問題的。（注同上）。我們對於現在中國紅軍之所以參加抗戰、與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混進國民黨的隊伍中來參加抗日，其原始目的，是不是如我們所設想的那麼純潔——完全為祖國而奮鬥，絕不受有其他使命，絕不含有其他作用？雖婦孺子亦可推知。

共產黨有一個最動人的口號，就是「革命」。他認為只有共產黨是革命的，其他政黨如果不受到共產黨的領導，都是不革命的，反革命的。他用這個口號來評價國民黨說：「抗戰以前，國民黨是不革命的，抗戰以後，國民黨是革命的了，假如國民黨不繼續抗戰，就是反革命。」誰高興承受反革命這不榮譽的而且極其危厄的名稱呢？於是「革命」「抗戰到底」，便成為他們的得意之作，便成為他們用以麻醉一切人的惟一工具了。他們惟恐說猶不足，更出之以恫嚇。在抗戰前，提出「抵抗外侮以安內亂」的口號，意思是「再不抵抗我就搗上，他們都是第二次日俄戰爭的戰鬥軍

，幫助解決遠東糾紛之中心的日俄東亞爭霸這個問題的。（注同上）。我們對於現在中國紅軍之所以參加抗戰、與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混進國民黨的隊伍中來參加抗日，其原始目的，是不是如我們所設想的那麼純潔——完全為祖國而奮鬥，絕不受有其他使命，絕不含有其他作用？雖婦孺子亦可推知。

到底」的口號，意思是說「如中途停止抗戰，我就和你分裂！」我們來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話（見論新階段）：

「戰爭的長期性決定合作的長期性」；

『只要在堅持抗戰與堅持統一戰線的大前提之下，可以預斷國民黨的前途是光明的』；

『誰不繼續抗戰，誰是只有一條當漢奸的出路，此外沒有任何出路』，看這些含有刑罰性的論斷，多麼有聲勢呵！可是我們無從了解，為什麼「合作」要以「戰爭」為條件？為什麼不戰爭便不合作？所謂長期，其限度如何？三年五年呢？十年百年呢？是不是繼續到和西班牙的結局一樣呢？共產黨對於中國抗戰的誠意還堪一問嗎？毛澤東更不惜造謠，不知從那裏斷取了蔣先生一段話，「戰事既起，惟有將全民族之生命，犧牲到底，再無中途停頓妥協之理」，說是蔣先生在廬山訓話時說的。我們再三查閱廬山訓話原文，根本沒有準備把全民族生命犧牲到底的語句；有之，惟

有共產黨準備犧牲全民族的生命吧！

共產黨既然視全民族生命如鴻毛，則其心目中自必無中國國家，更無所謂國民黨了。他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兩黨為基礎」，「為了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共產黨必須擴大其組織」，「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鬥爭的黨」，「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

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也就是史太林的意旨。史太林根本不願意中國抗戰勝利，只希望中日雙方消耗實力，好讓蘇聯便宜的攫取遠東霸權；只希望在遠東造成他們的赤色狄克推多。所以毛澤東所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也止於希望中國繼續抗戰，繼續消耗實力，消耗到精疲力盡的境界，而後中國共產黨可以一舉手而攫得中國政權，一舉手而造成蘇聯的中國蘇維埃聯邦。計劃不可謂為不大，用心不可謂不長的了！也許還有人以為中國共產軍（如八路軍新四軍等）參加抗戰是完全對日的，我這里可以提出共產黨的當今皇帝史太林的話來回答他們，史太林最近在蘇聯共產黨十八屆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有一段批評英美法對於遠

理論的學術的探討上談，我們也可不必多找麻煩，可是這是說明抗戰形勢的報告書所謂「論新階段」呵！我們時聽得中央當局聲明共產黨員已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來擁護三民主義，現在他們所擁護的究竟是什麼呢？

毛澤東的言論不是私人談話，乃是

：「在黨派問題上說來，就是容許聯合統一，同時又容許其獨立生存，」這種解釋，不知是根據民權主義第幾講？他對他自己的主義，宣布「共產黨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與共產黨主義理想；共產黨有自己的黨綱與政綱，其黨綱是社會主義與共產黨主義，這與三民主義有區別，其民主革命政綱亦比任何黨派為澈底；」中國共產黨人的信仰中，還有絲毫三民主義嗎？談主義，如果他是在作

東問題的話：

「日本進攻華北之前，英法各報皆廣事宣傳中國之軟弱無能，不堪一戰；以日本之軍力，能於兩三月內征服中國；於是英美政治家乃旁觀坐待其發展；及日本已對華作戰後，彼等聽其佔領在華外國資本中心之上海，聽其佔領華南英國獨佔勢力之中心的廣州，聽其佔據海南，包圍香港，此與鼓勵侵略何異？」

英法一味因循苟且，不僅對遠東問題爲然，無須多議。然而蘇俄呢？如果蘇俄是抱有制裁侵略國家的志願的，九一八便該仗義而出！張鼓峯事件便不該鳴鑼收兵而把抗日大將加倫撤職嚴懲！

中國抗戰以來，蘇俄所供給的一些軍火——雖無關宏旨，也該送到以前的南京或現在的重慶，不應逕自交給西北紅軍！這些是鐵打的事實，誰也不能翻案。蘇聯——史太林——毛澤東的唯一希望，希望中與日戰，英與德戰，法與義戰，美與日與德與意戰，世界上所有國家

相戰，除了蘇聯；戰事愈久愈佳，中途停頓便是漢奸英奸美奸。你們應該互相戰爭，而我不必；你們應該滅亡，而我則興！」

從任何方面檢拾，沒有絲毫材料足以證明中國共產黨有愛國性，沒有一件材料不足以證明中國共產黨是受命蘇聯而從事毀滅中國的，他們爲要實現其陰謀，不惜使用最卑劣的手段：強辯，誇大，搗亂，搶奪，造謠，誘惑，威嚇。

事實上，現在的蘇聯已離却主義鬥爭，而一味從事政治奪取了，可是他始終強辯他是在革命；

他，誘惑熱血青年到西北去，供他們驅使，驅使到外蒙，驅使到新疆，驅使到莫斯科，教他們忘去祖國；

他，用「反共即反革命」來威嚇國民黨，用「主和即漢奸」來威嚇大衆，用「不繼續抗戰立即分裂」來威嚇政府；

中國共產黨，他還有絲毫中國人的良心嗎？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不是共產黨的中國；抗戰是要救中國，不是要亡中國。我們要認識抗戰的目的！認識自己的國家！我們更要認識共產黨的陰謀！

(註)雜誌三卷二期，弟羅里倍斯著，張振耀譯：「二次日俄戰爭在進行中」。

他，公然毛遂自荐的製造新聞，希望周恩來任國防委員，希望毛澤東長軍政準備立刻搶奪中國政權（消息載二月份各報）；

他，亂造謠言，咬定上海愛國志士的効奸行動均是日人所爲，（重慶共黨機關報新華日報社評），使真正愛國者聞而喪志；

第三條路（中）

拼命主義的反面是投降主義，二者實在是一體的兩面，都是由於同一的錯誤認識而來的。其間的差別至多是程度的，決不是本質的。二者都有一個最後的自私自利的打算。拼命主義者覺得即使把國家的命拚掉了，自己至少還是可以成爲一個失敗的民族英雄，供後人憑吊，反正中國歷史上的英雄，十九都是失敗英雄，他們的口號是「雖敗猶榮」。投降主義者覺得即使國家給人家亡了，自己祇要肯俯首貼耳做個順民，說不定還有大官可做，個人的享受至少是不成問題的。這二者共同的地方，便是把個人的私利放到了國家的公利之上。

但是投降主義並不能夠像拼命主義一樣的喊得響，贏得多數人的同情。所以投降主義者不能不借妥協，善鄰，和平，乃至光榮的和平等好聽的名詞，作爲掩飾。可是投降畢竟祇是投降，投降的結果，未必就是和平，更談不上是光榮的和平。正好像拼命主義的失敗英雄，徒供後人憑吊一樣，投降主義的漢奸傀儡，除了保全個人的利祿而外，決不會另有別的意義，並且事實上連這一個目的是否真的能夠達到，也還在不可知之數。

現在讓我們根據事實再進一步的對上述兩條路作一個總

的檢討。

『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二十閱月以來的抗戰，固然已充份的證明了中國是『能戰』的了。但是，「能戰」未必就是「能勝」，尤其不可和「必勝」混爲一談。相反的，善泗者弱，善戰者敗，歷史上的先例是指不勝屈的，把「能戰」的功效估計得太高時，往往會使自己走到毀滅的路上去的。拼命主義者一面把二十閱月來「能戰」的事實所包涵的意義，估計得太高，以爲於此已足證明將來的必勝。但同時在他方面，却又把此項意義估計得太低，直到現在始終還牢牢的記着那包涵着多量的恐日病毒素的口號：妥協就是滅亡。一個還能戰的國家，不忍再戰而妥協是決不會亡的。最近的事例是上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德國在簽訂和約之日，雖經慘敗，但至少還是能戰的，所以二十年後，又恢復了過去的地位了。過與不及都是不可饒恕的錯誤，此種錯誤造成了今日國策上進退維谷的困境。

拼命主義的錯誤，同時也就是投降主義的錯誤。投降主義不敢相信能戰真的能和，以爲要和除非投降，這是由於他們把能戰的意義估計得太低太小。同時他們又以爲既經過去的二十閱月來的抗戰，浩氣已經長存於天地之間，目前即使

投降了，將來必定還能夠復國的，這又把能戰的意義，估計得太高太大了。

我們要從泥淖中拔出我們拼命主義和投降主義兩條泥腿，根據此時此地的實際形勢，指出我們可以走的應當走的第三條路來。

這第三條路是建築在下列三個正確的前提上的：

第一，中國不會亡。不僅是由於她的地方大，歷史長，人民多，並且也由於她的處於彈性的社會結構。二千餘年來，西洋社會從奴隸制到封建制，從封建制到資本制，而今，又到了資本制的末期，到處在感受着社會革命的威脅。中國呢，二千餘年來，奴隸制，封建制與資本制始終是犬牙交錯地並存着，此種特殊的社會結構，在平時雖足以阻礙社會的進步，在非常時期却足以防止社會的崩潰。所以當戰爭爆發以後十年來社會革命的危機是無形中化除了，二十餘年阻礙着社會進步的軍閥勢力是被淘汰了，在失去了半壁河山的今日，在軍事上雖似有窮途末路之感，但在政治上却反而啓示着光明的前途。我們知道，只要政治上有辦法，國家是絕對不會亡的。

第二，日本不會敗。近來一般人時常有一個奇怪的想頭，以為中國不亡，則日本必敗，日本不敗，則中國必亡。我們在以上既證明了中國不亡，在這裏更將證明日本不敗。普遍認為日本必敗的理由大概不外下列數點：一，日本將被困

於我方廣大的游擊戰而遭失敗；二，日本將以物力上不能持久而敗；三，日本將以國內反戰運動擴大而敗；四，日本將以不堪國際的經濟乃至武力的制裁而敗。茲先就前三點加以論述，而將第四點併入後節討論。廣大的游擊戰對日本的遠征軍，固然是一個威脅。但此種威脅，對於日軍，決不是致命的威脅。威廉亨利張伯倫說：

「日本是否會被困於中國的游擊戰呢？目前固然還不能作確定的絕對的答覆。但日本根據在滿洲的經驗，相信此種抵抗，可以在數年內減少到不足道的地步。滿州國的地位，在今日從日本人的眼光看來，無疑的是不成問題了。零散的叛亂，並未能使其經濟上無法維持。一九三一年以來，生產和對外貿易已見增加。鐵道是切實地在增設着。幣制穩定，租稅照收。即使每年有數百人因征剿那些在日本稱為盜匪，在中國稱為愛國志士的不滿份子而遭犧牲，但這在日本軍事領袖眼光中是看得很小的。當然，日本也未免把橫在他們面前的困難，估計得太低，因為受正規軍應援着支持着的游擊隊，將使日本在中國的任何經濟建設，較過去在滿洲國更其困難。祇是在目前，由於中國的游擊戰的結果，日本的軍人方面還沒有想到任何建設方面。日本人民移住於中國的淪陷城市來的，已很多，不僅在平津和上海，並且還在山西省省會太原和平漢路上的石家庄所有這兩處地方，都是很接近於激烈的游擊活動區域的。如果他們知道日軍將被逐出於此項

佔領區域，恐怕也不會作此項移植了」。（三月廿九日英文大美晚報轉載亞細亞雜誌論文）。

這位中立者的意見是值得我們尊重的。目前游擊隊的還不足以成大事，本來是國內共同的見解，即毛澤東也曾坦白承認。不過我們的毛澤東，本其巧妙的辯證法，把握住「變」的因素，以為在持久戰的過程中，無嚴格紀律，無政治意識，無戰鬥力量的游擊隊，會從長期的作戰過程中，逐漸變為有嚴格紀律，有政治意識，有戰鬥力量的正規軍，而在抗戰第三期中擔任反攻的任務。「變」我們是承認的，但是變好還是變壞，是一個事實問題，抗戰到現在已經一年又十月，抗戰進入第二期後，迄今也將五月，要「變」是應當「變」了，究竟在「變好」還是在「變壞」，也應當有事實來證明了。東北的義勇軍變了七年究竟變成了怎樣？變好了還是變壞？現在游擊隊比起東北的義勇軍來，所差的祇是有正規軍遙為應援和支持。但正規軍本身既不能克敵制勝，一經用以遙為應援與支持，便能有如此妙用，足以使游擊隊發生質的變化，有誰肯信？

關於第二點，上面所引的論文「作家」說：

『日本的最弱之點，是在其財政和國際收支平衡狀況。日本自從佔領滿洲以來，預算始終沒有平衡過。它的國債在一九三一年約為六十萬萬圓，現在是一百六十萬萬了。到一九四〇年時，將達二百萬萬以上。由戰爭所引起來的出口

貿易的衰落，差不多從日本全部的存金中剝奪掉了五萬萬圓之譜，此項存金是作為平時的通貨基金用的，雖然日本的貨幣實際上是不兌現的，對日圓集團以外各國的貿易入超，約達五萬萬元。我們不能忽視這些經濟上的危險表徵。但是我們也不應將其重要性，估計得太大。誰會真的以為有一天日本會因經濟破產而召集閣議，議決停止對華戰事？日本所以不作這樣的舉動，唯一的理由是因為此種內閣，一定會被軍部的機關槍所掃射掉。歷史上充滿着比日本還要不顧嚴重的經濟困難而對較強大的優勢國家經年作戰者。果然日本是在財政的困難中，但同樣的世界上每一個強國，多少也都在此種困難中。如果美國每年能夠以十萬萬美金無限期的維持其失業者，那末日本為了實現其偉大的大陸政策，當然也能以如此巨款投資於對華戰事和滿洲國的開發。這樣的做時，還有一個意外的利益，就是使他國內不安的情緒得向海外發洩，免得在國內謀害其政府大臣。

『戰爭對於一般在都市和鄉村的日本人，固已發生嚴重影響，但還沒有達到足以使其工作效率或民族精神感受到嚴重威脅的地步。官方的統計顯示出自從戰事爆發以來零售價格已增高了百分之十五以上，一般生活費增高了百分之十，工資水準增高了百分之五弱。在戰時繁榮和恐慌往往是無規律地分配着的。大學和專門學校的卒業生，都能經請求而獲得職業——這是年來失業潮流中一種可喜的轉變。日本已

有其勃興的軍火製造中心，（九州八幡的大鋼鐵廠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在這裏熟練工人，其所得的工資，以東方的標準看來是稀有的，每人每月有二三百圓之譜。僅僅是那些小手工業，無法適應戰時環境，並因受進口限制的影響，無法獲得原料。

『日本戰時經濟中最強有力的一點，是其食物的自足。日本及其殖民地和附屬區域，有足供人民所需的一切食物：米，魚，豆，菓子，蔬菜，糖。在一年有半的對華戰爭以後，日後並沒有像德國一樣在食物方面發生困難。日本也沒有被迫走上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蘇俄的命運，其時因加速率的工業化，使其各方面都呈滿足而獨缺口糧。

『經驗告訴我們：除了戰場上的決戰失敗之外，嚴厲的糧食缺乏，實為後方對作戰前途發生動搖的最有力的原因。人民在被戰時心理操縱之下，是不會因限制汽油致沒有按時開行的公共汽車坐，限制進口致沒有船來品用，缺乏原料，致房屋破了不易修理而起來革命或怠工的』。（同上論文）

關於第三點，我們知道，日本的反戰心理，雖很普遍，但據上述作家在同一論文中說：

『日本是不是會因疲於作戰而罷兵呢？假如把單純的和戰問題來舉行一次人民投票的話，我想，大部份的日本人，是會贊成和的。這大概任何一個在作戰中的國家，都是如此

的，假如我們和那些有兒子丈夫或弟兄在前方作戰的人作私人談話時，我們一定會發現他們和其他國家的人們一樣對於他們所愛者的安全，必定較他們在報紙上或無線電中所聆到的高調更其關心。但是在此種心理和革命的反戰運動之間，還隔着很闊的距離。日本人民正好像一部用油擦得好好的機器，一時是不會損壞的。在心理上，日本人決不會因為顧慮到戰爭會使其全家陷於不幸而決然的成為一個有意識的反戰者。他十分知道這樣做時，他的父母就不能不自殺了。

『有人把日本的對華戰爭，比之於拿破崙的進佔莫斯科。這我想，立刻有事實來證明其不當。因為日本在中國具有着拿破崙在俄羅斯所沒有的東西：一個可靠的交通上的鐵道網和水道。中國的焦土政策所加於老百姓身上的災禍，遠較其加於日軍者為大。雖然在未佔領區域內，擠滿着從各方逃避來的難民，但大部份人口稠密的佔領區域內的人們，却不能不留在日本人勢力之下，謀糊口之計，這和他們的祖先在過去被蒙古和滿洲人征服時的情形，多少有些相像』。

上面所引的幾段話，其觀點當然不是絕對正確的，但至少是站在中立的立場的，從這裏我們至少可以知道：日本必敗論完全是掩耳盜鈴的自欺欺人之談。即使僅用以鼓勵士氣，也還不免是害多利少。

長期抗戰與製造無產階級

何家駒

在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戰的口號之下，為國人所共棄的中國共產黨，又乘機跨入中國的政治舞台；而且操縱了所謂抗戰的實權，實行他消滅國民黨以赤化中國的陰謀。

這一次的全面抗戰，本來是國家存亡民族生死所繫的關鍵。可說是歷史上劃時代的神聖偉大的事業。對於日本軍閥那種得寸進尺的侵略政策，的確需要予以重大的反抗與打擊；否則我國家民族的命運，總不免有斷送於日本軍閥之手的危險。所以我們抗戰的唯一任務，是在解除壓迫與束縛，而求獲得獨立自由的地位。在這種意義之下的抗戰，我們毫無疑義的應該犧牲自身的一切利益，竭誠擁護，一致努力，爭取最後的勝利，以完成抗戰的使命。

然而抗戰開始以來，政府的種種措施，顯然地揭露出了所謂抗戰的發生，並不是由於既定的國策來挽救國家民族的疆土，而是受了共產黨的煽動與挑撥，給蘇俄第三國際作赤化中國的工具的。這不是我們的揣測之談，却有來根去脈可資依據的。

共產黨自從在中國腹地各省給剿匪軍打得落花流水，潰退到陝甘諸省的邊疆之後，蘇俄第三國際，覺得僅憑武力來奪取政權以造成蘇維埃政府的不可能；同時，由過去所演的罪惡而深深映在民衆腦海中的印象，更覺得無法取得社會的信仰以與國民黨相抗衡，因而決計改變策略，從利用國民黨的基礎入手，進行他移花接木的手段，無形當中，使國民黨的主義與精神，漸漸受其同化，持國民黨，發動其先發制人的七七與八一三的大變動。戰端一啓，勢如已發之矢，要想避免犧牲，挽回危局，談何容易？以致造成現在的僵局。

國民政府及蔣委員長的原始政策，憑良心說，一向是以救亡自強為立場的，

的口號之下，引起全國民眾的同情而消除過去的惡感，同時迫使國民黨無法逃避這個全國熱烈期待的責任，而接受他們的意見。所以共產黨到了陝甘諸省的邊疆之後，一方面拚命製造仇日排日的空氣，激起民眾感情的衝動，一方面勾結失意軍人張學良楊虎臣等安排圈套，誘致蔣委員長墮其彀中。西安事變，即是共產黨陰謀的成功，也是所謂抗戰的有力動機。

蔣委員長在西安脫險——其實是上當歸來之後，共產首領周恩來，馬上追蹤到京，緊隨左右，施其蠱惑的詭技，從此國民政府的政策，一變過去緩和國際環境一意埋頭建設的主張，造成急轉直下的親俄容共抗日的政局新形態。共產黨更利用七七蘆溝橋的局部事變，挾持國民黨，發動其先發制人的七七與八一三的大變動。戰端一啓，勢如已發之矢，要想避免犧牲，挽回危局，談何容易？以致造成現在的僵局。

所以屢次遭逢日本的無理壓迫，都處之以鎮定，出之以忍耐，避免正面的衝突。根據中國的現狀，實在沒有單獨與人作戰的可能與必要。我們目前所需要的，是盡量開發富源，促進生產，努力建設，以充裕財富，使凋蔽的國計民生得以復蘇；一旦國力充實，國家民族，自然隨之復興了。因此，九一八，一二八，遭遇十倍嚴重於七七事件的問題，國民政府及蔣委員長，都以釜底抽薪的策略，化大事為小事，化小事為無事，卒能渡過難關，繼續努力於建設事業及發展國民經濟政策的推行。假使不是共產黨的推波助瀾，決意造成戰爭的話，那末這次的抗戰，是絕對可以避免的。蔣委員長並且很沉痛很懇切地昭告於全國，他說：「我甯願受人責怪，其產黨的謾罵，一絕不願把國家民族作孤注的一擲，我不能像別人一樣的只顧造成自以為光榮的所謂『民族英雄』的地位，而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的境地」；和平救國的盛意，溢於言表。他更說：「和平非至絕望的時期，絕對不願放棄和平；犧

牲非到最後關頭，絕對不肯輕言犧牲」。以九一八，一二八，這樣嚴重的局勢，偶發的地方事件，而且日方已提出輕而易舉的解決方案，難道是蔣委員長反認爲已是和平的絕望時期，犧牲的最後關頭而非兵戎相見不可的麼？記得何應欽先生演述華中華南的國防準備，表示對抗戰前途的勝利有所懷疑時，共產黨馬上發出「主和即漢奸」的惡意侮蔑，而蔣委員長也惱於西安被厄時與共黨所訂的秘密條款與畏懼蘇俄第三國際的脅迫也不能不忍痛犧牲其「和平建設，自力更生」的素志，而眼看著國家民族的一線光明，給共產黨的陰霾所籠罩，走上茫茫長夜的黑暗之途。

蘇俄第三國際的企圖赤化中國，處心積慮，已二十年之久，他的策略。是以「製造無產階級」爲經，以挑撥戰爭爲緯。前者的目的，是在造成其所謂「社會革命的客觀環境」；後者的意義，是在削弱統治階級的政治勢力。從北伐開始到統一告成，中國共產黨始終遵着這個路線進行其赤化陰謀，每當一次內戰的發生，即乘機發展他的製造無產階級的效能。他們的理論是這樣的：中國的社會狀態，還是在半封建時代的小資產階級的階段，都市的工人，因爲中國機器生產的落後，絕對不能像資本主義先進國一樣的形成特殊的工人階級的「意的沃羅基」，即是沒有明顯的仇視資本家的心理，更沒有健全堅實的組織；所以僅憑工人的力量，要想達到推翻現社會的制度，打倒反動勢力的統治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社會主義政權，是不可能的。中國現在的社會基礎，還是大半建築在農民身上；不過，農民的本質與工人不同，雖在農村破產，生活困厄的現狀之下，他們的階級意識，終究含有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即是保守的，自私的，沒有挺而走險的勇氣與精神。所以共產黨認爲農民雖是實現共產主義革命的主要力量，但需要改變其階級意識；於是就大肆其製造無產階級的毒策。他們利用打倒土豪劣紳，沒收土地的口號，燒得百姓無家可歸；只要

有地，不論一畝二畝，都是地主，就應該沒收；所有農民的財物，也在共產黨主義的「共」字之下，給他們的嘍囉般無產階級的紅軍共去了。這樣一來，不論是小農佃農自耕農，甚至於大小地主，一霎時都有成爲無產階級的可能，替共產黨造成客觀的條件。民衆既已陷在貧無立錐的境地，要想繼續生活下去，實不可能，於是共產黨來組織民衆了，他們要負起爲無產階級謀幸福的責任了，這樣就把自己一手造成的新無產階級的農民羣，再驅使他們去焚燒別處農民的房屋，沒收別處農民的財產。輾轉製造，全國的農民，均將成爲他們的無產階級，而共產主義從此成功，蘇俄亦化中國的大志也可實現了。

現在的對日抗戰，正是共產黨製造無產階級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們再無須像以前那樣的零零碎碎還要顧忌輿論的攻擊與民衆的反抗，現在可以恣意焚燒，燒得寸草不留，使一批一批的難民，流亡載道，哀鴻遍野；他們高舉着「長

期抗戰」的招牌，實行他們別有用心的「焦土政策」；他們認爲：爲了避敵利用，何況所焦的還是「土」不是「人」哩！自戰事發生到現在，這二十多個月中，統計全國犧牲的人數及物質，據說損失在砲火之下的還不及損失在焦土政策之下的十分之二三。這大批無辜的百姓，爲了共產黨的要造成自己需要的客觀環境，而受此空前絕後的浩劫，真使人有不知所云之感！這樣的抗戰，是爲爭取國家的獨立自由麼？是爲希求民族的解放復興麼？恐怕再戰下去，全國土地都全部焦爛，全國百姓已全數絕滅，還有何獨立復興之可言呢？

我相信以中山先生的自由平等博愛爲精神的國民黨及其政府，與素以和平救國自矢的蔣委員長，絕對不願施行這種禍國害民的毒辣政策的，現在這樣縱任共產黨的胡作胡爲，其用意無非想保持抗戰的進行吧了！其實這是錯誤之至的失策，抗戰的目的，在求國家的獨立

自由，今爲了抗戰反使國家原氣無端的斬喪，更將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境。抗戰的使命，是爲謀國家民族的解放復興，今民衆在長期抗戰的烟幕之下，受盡焦土政策的戕害，將盡在共產黨鐵蹄下犧牲以終，我想中山先生在天之靈有知，亦將爲之而痛哭流淚了。

編後（一） 記者

本刊第一期問世後，除了本埠一些小報曾經用一段皮相的譏罵文字污蔑本刊是汪派的喉舌也就是所謂漢奸刊物外，其他方面，還未見加以何等批判。我們始終是這樣：國家的生死存亡問題，每個國民應該起來說話；本刊所說的話，如果以爲對，希望大家贊助我們，共同努力；如果以爲不對，希望大家平心靜氣地拿一點真憑實據和具體的理論來指正我們！至於像某某報（它的背景盡人皆知）那樣，幼稚的，膚淺的，不從理論上探討，一味狗血噴人，我們沒有許多閒情來理會他；可是我們也不忍立即視之爲狗，仍舊希望他們拿出一點中國人的人性來讀讀本刊，或者請他們再讀三年書而後來同我們說話！終有一天會解決「究竟誰是漢奸」這問題的。

青年思想談什

余文周

三 以中日事變的因果爲例
我們根據「凡百事物，皆是多邊的，相對的，受着外圍關係之影響的」和「凡百事物，皆是時刻進化的宇宙間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從而論斷「沒有長期動人的口號，沒有長期適用的政策」。這個論斷可以說明「中日事變」中何種問題呢？

一般人皆以爲中日事變，是由於日本一手造成，其實是「似是而實非」。我並不是說日本不必負責，也不是認爲日本是好人；我是要說明事變發生之原因，不在日本一國，也不僅中日兩國。它是由於複雜錯綜的國際關係牽引與激盪而使然，尤其是遠東的國際關係。試就最淺顯的關係來說：

我們知道，現時遠東的國際勢力，是由英美日三國鼎足而立的。中國的地位是怎樣呢？

中國自開闢以來，國家的生命權一

儘操於英國之手。大戰以前：英國是遠東的主人；日本是奴僕，只供英國的驅使，毫無主作用；美國還是門外漢尚未涉足藩籬；中國乃是英國一家的俎上之肉。此時中國本身既無動彈之力，宰割

中國的正副劊子手英日二帝國主義，也正是喚味相投，狼狽爲奸，所以整個狀況安靜無聞，無所謂衝突，即或有之（如中日中英歷次國恥事件），不旋踵便由英國一手壓平了。

大戰而後，遠東的形勢大大改變了

：一是英國因主力歐洲之故，把遠東事

務托交日本，日本的地位因此抬頭，並因加入協約國之故，在和會中取得不少：英國的勢力毫無進展，且形後退，但她的根基厚，所以一直還不失爲中國的頂上司。美日兩國其勢力與時俱進，其地位已與英國並駕齊驅，日本完全脫離了英國的支配而想稱霸遠東。另一方面，其產主義的蘇俄，在新興之後，亦鼓

宰割的中國說過幾句公道話，不期然而與遠東結了不解之緣。由於這壓迫被壓迫兩個方向的激盪，遠東便形成兩大平行潮流：即英國以日本爲支點向東發展，美國以日本爲支點向西發展。可是中國並非純粹屬於美國的，故在兩大潮流激盪之下，結果是東招西應，多面犧牲。當此之時遠東本有隨時發生事變之可能，但是因爲：（一）各國在大戰之餘，精神物質尚未完全恢復；（二）此時的競爭側重於商業範圍，無掀起戰事之必要；（三）各帝國主義者之間均趨向妥協；所以便有事無事的彼此敷衍下來了。可是病根早已於此潛伏。

自此而後，迄於最近，遠東國際勢力的變化，更是日新月異了。總括言之：英國的勢力毫無進展，且形後退，但她的根基厚，所以一直還不失爲中國的頂上司。美日兩國其勢力與時俱進，其地位已與英國並駕齊驅，日本完全脫離了英國的支配而想稱霸遠東。另一方面，其產主義的蘇俄，在新興之後，亦鼓

國際局面昭然的有四種圖案在出奇制勝：一是美國的太平洋圖案，以三A政策為基礎；二是英國的遠東圖案，以S大陸政策為基礎；三是日本的東亞圖案，以蘇維埃政策為基礎。這四種圖案的勢力與進行速度，幾乎各不相下，試問中國在這四種圖案的競爭之下，其狀況將為如何？

這四種圖案的競爭性質，亦有一根本不同之點：即英美兩國因素主保守及相隔遙遠之故，而取緩進；日俄兩國則因近水樓台，故競爭趨於積極。尤其是日本，她的發展途徑太狹窄了，而且她無論要向那一方而發展，非先取得陸地基礎不可，這是日本首先問鼎中國的主要原因，無疑的，日本之進攻中國，其最終目的不在征服中國，而在第一排出蘇俄，再排出英美。相反的蘇俄英美之支持（？）中國抗戰，其目的亦不在幫助中國，而在抑制日本。試問，中國在如此局境之下，應該傾向蘇俄英美而繼續為他人抗戰？應該向日本屈服甘作奴隸呢？還是應該利用她們相互間的矛盾打

出一條自立的生路呢？——如果青年諸君肯靜靜地客觀地運用智力把問題解析一下，當不難回答這個當前大問題。

我同時記起一件事來：「甲午之役」

，結局是三國干涉歸還遼東。但在當初，俄德法之間，意見有參差，俄國向中國索取報酬，爭執不下；而日本則倡言中日之事應由中日直接交涉，拒絕第三

者參預；因此三國迄未能有具體的行動表現。其後中國急不能待，逕派李鴻章

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三國聞之，乃投袂而起，意見立即一致，而遼東因此收復」。這段史實，與現時的中國情形正復相同。原來帝國主義者只為自己而不

為他人的：她們對別人家的戰爭，誠如杜倫德所說：「全世界很高興雙方都遭受到損失」；她們對於別的帝國主義者，希望「有福同享，有禍你一個人去當」；她們對於被壓迫的民族，「視作一只馴羊」。她們為自己，總希望可能多獲得一些，但是到了無可多獲得的時候，她們

自身還不知道向什麼方向去走！

清醒的青年諸君呵！我再重複說一句：「凡百事物皆多邊的，相對的受着外圍關係之影響的。凡百事物，皆是時刻進化的。宇宙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沒有長期動人的口號，沒有長期適用的政策」。諸君不妨再向更大的事物想一想：太陽之所以不會落到地球上而懸空掛着，不是因為受着其他星球的多邊牽引嗎？天體有不少星雲將要形成星球，又有不少星球將要毀滅而成星雲，不是因為宇宙本身是進化的嗎？中國在地球上，在宇宙間，中國應該進化，亦非進化不可；時至今日，中國應不應該死守那一成不變的口號與政策，永遠停頓在時代的後面呢？應不應該利用現實的多邊形勢，以創造中國的新生命呢？

不但不會競爭，反而會妥協起來：「反

——待續——

游擊隊在鄉間

石英

——通信——

戰事展開以來，民衆受盡了戰爭的

與實力，真相究竟是怎樣呢？

痛苦，抗戰之初，先是替自家軍隊服務，如築路，運糧肩子彈，挖戰壕……事情雖苦，還存着打退東洋人替中國人出一口氣的希望，自己安慰，自己興奮。老百姓本來是贊成抗戰的。等到自家軍隊撤退了，東洋兵進來了，再度受着東洋人的威凌壓迫。現在，自所有的淪陷區域改游擊區之後，中國民衆三度受着自家軍隊與東洋軍隊雙方的重壓，真是抽筋而又剝皮，剝皮而又抽筋，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了！國軍既然撤退，我們淪陷於一切權威超於一切的「游擊隊」的身上，犧牲了生命，仍舊存着自信自慰的，仍是存着熱望在這班「游擊隊」身上。但是目前一般游擊隊的分子與組織，訓練

說，委實太使人傷心了。但是他們的傷心不祇是弱者的悲觀，而是看了眼前的事實，使我們不得不承認着自己的弱點。我們應當平心靜氣的「承認事實」——認識自己」，切切實實考慮一下，而後才能發見出合理的有效的辦法來。

我們知道游擊隊所以神聖，在於對敵人抗戰，為國家民族盡保衛疆土之職

死存亡的最後關頭，我們要根據事實說老實話，絕對不容一誤再誤，輕視事實，欺騙自己。我們第一要發見自己的弱點，第二要承認自己的弱點，第三要研究自己的弱點，第四要改革自己的弱點，把這弱點的根本上糾正過來，然後，我們才能不違反「事實」轉弱為強。若是對於自己的弱點，不許發現，不知分析，不肯承認，不加改革，一味的掩飾自己，欺騙自己，大吹大擂，又以弱點認爲優點，那末弱點將永遠不能糾正，抗戰便永遠不能得到勝利了。因爲事實終究是事實，一味的掩飾事實，違背事理

有錢的要錢，無錢的便要你的老命。所以大多數的民衆，都怕游擊隊如虎，他們對民衆正和東洋兵一樣：勒索拉夫，姦淫焚劫，無惡不作。但是他們看見了東洋軍隊便怎樣呢？如果用算學方式來表示，那正是等於一個「民衆看見他們自己」一樣；結果是來不及逃避。可是

這些事實要想在報章上看見自然是十分困難的，即是有，至多也是輕描淡寫：如某部游擊隊分子復雜而改編，某某部隊行動無紀律爲某軍繳械，給人以蛛絲馬跡的暗示罷了。而事實呢，許多失陷城區中的逃難者，他們所逃的並不是東洋人的難，却是逃游擊隊的難。游擊隊知道東洋兵快到了，便悄聲匿跡得無影無蹤，而報紙上的紀載，却稱譽他們在與敵軍忠勇戰爭之後，完成了任務而向後撤退。他們時常拆毀鐵路，但他們的目的却是把鐵軌當做廢鐵出賣白肥，而且結果更是賣給東洋人。這種比漢奸卑鄙可惡的行爲，報紙上的宣傳却是稱讚他們勇敢多智，破壞敵軍的交通。至於最普通的現像：東洋人到別處去了，他們也回來了，祇要有十幾個東洋兵到了，他們又無聲無息的逃走了。報紙上却大吹大擂的說他們與敵軍進退磨擦，消耗敵人實力，以及戰事劇烈，收復某地，反而落得刮刮叫的名譽。他們看見了報紙上替他們吹捧，結果更是蠻橫無忌，只有使做百姓的大遭其殃：東洋兵來

了，說他們是游擊隊的窩巢，毫無辨白餘地的燒掉你的房子，最後還要男的給他拷打，女的給他們姦淫。縱然千求萬懇幸而不燒了，但是明天游擊隊來了，他說東洋兵不燒你的房子，你是漢奸，結果又要拉去拷打，拿出錢來贖身，說

以漢奸的金錢助他們抗戰的經費，冲去了家產，更要燒光你的屋子。於是民間的生活，性命，完全毀滅在他們的刀槍火燭之下。考究這些游擊隊的分子，他們多是當地的流氓、土匪、光棍、盜賊，他們乘亂行劫的機會，政府又無法過問，便假借了游擊隊的美名，公然劫掠，肆意橫行。他們的野蠻、殘酷、狠毒，最普通的一種：「小人一旦登天」的威風，氣概，真是不可一世。同時他們又利用漢奸與東洋人通聲氣，東洋兵快來了，漢奸便通知他們逃走。搶得的財物，勒索的捐稅，同漢奸講好「拆頭」。有時即與東洋兵相遇，他們無法逃避，就四散隱伏在民衆家裏，東洋兵不分皂白，認定民衆是游擊隊，以民房爲開火的目標

，以爲報復。而游擊隊每逃至一地，起初以公然籌餉，勒捐，弄得民生塗炭只是賸了一條命了，便抄他們的家，只要是可吃的財物，一刮而光。一地光了，又到一地，一隊未去，一隊又來。

亡中國的不是東洋人，而是中國人

自己呵！亡中國的不是中國的老百姓，而是那權威高於一切冒稱救國者自己呵！

——四、五——

編後（二） 記者

汪先生的三月二十七日談話，本埠各報，除大陸新報等披露過日譯的全文外，皆未見刊載。而日譯及其再譯，文字也頗有出入。本刊所載，是宣言原稿。我們想到以汪先生這樣赤心爲國的偉大領袖，他的說話竟也不能自由，不禁對所謂民主的招牌和社會輿論不勝其沈痛的感慨！究竟汪先生的言論是不是較之共產黨的蘇聯文字爲惡毒可怕？希望讀過汪先生的言論之後的人下一個良心的評判。這種判斷，並不是對汪先生或某個人或某方面負責，乃所以爲國家！本刊態度和汪先生的態度一樣，只要有人能明白我們的用心，任何犧牲我們也甘願了。

重慶大公報所載之推背圖

晏 扶

日前本埠各報，以顯著之地位，登載五日路透社發表重慶大公報宣佈之所謂汪精衛與平沼所訂之秘密協定；原文贊長，洋洋大觀。逆料信口「汪氏漢奸」者又多一絕妙好詞矣。筆誅口伐，吹影雌黃，必更甚於昔。吾人本可洗耳恭聽，靜觀經技；惟稍察宣傳內容，莫須有之情，固已大白，對茲不禁失笑之玩具，安得無一言以嚮之？

該項協定，既係秘密，情節復如此重大；則具體內容，除汪先生與平沼及參與其事之主要機密人員外，孰可得而知之？而據報載該項秘密竟得之於中國當局自充日人擗負之謝某，其信乎其不信乎？設謝某即能獲得其情報，而條分縷析，抑若斯之詳耶？其信乎其更不信乎？

溯汪先生處於抗戰以還，疆土日削，元氣日喪，長此堅持，必無果勝；而共黨竊政，暗賣華主，國家生命，益見危殆；適日相近術發表調整中日關係之聲明，解決爭端，有相商之餘地；遂毅然主和，期拯救國家民族于萬一之機。

惟恐主張不容于怪劣份子，不惜拋尊去穎，亡命海外，以孤身無依之身，作竟日秦庭之哭；數電中央，建議大端，並告國人，切陳利害。只此而外並無其他舉動，事實俱在，中外共認。洎乎河內慘案發生，先生為避免無謂之殘害，易地以居，事誠有之，固猶戀戀於國事之重，再告國人，體念國家。只此而外，並無其他舉動，事實俱在，亦中外所共認也。然另一方面，惟恐中國不亡者，其猖狂為如何乎？當汪先生去國之日，各報所載，不曰「汪氏已離河內，前往香港，擬至廣州組織華南政府」，即曰「汪氏已潛來上海，將參與南京偽組織」，且確指「某日楊樹浦虹口一帶戒嚴，係保護汪氏登陸」。凡此消息之來源，不冠以「某方確息」，即加以「業已徵實」之斷語。顧結果如何耶？至汪先生

與日本勾結之消息，尤屬聞之鑿矣；今次所傳之秘密協定，文稱確乎有聲有色，雖假若真；直令人有撲朔迷雲翳難辨之感；然試將全文，稍一窺摩，依然不足識者一笑也。嗟乎！天下之大，無奇不有；雕虫之技，亦有精粗！吾人於領教用心之餘，則又不得不驚嗟虛偽家已進於古箋名手之道焉！請述數點，以徵其技藝之不凡：

一、日軍近因我國不肯言和，乃又展開各戰區之猛攻；南昌要陥，且已陷落，其他各地戰事亦有日趨擴大之勢。該協定中，乃有規定日軍猛攻限期佔領西安，長沙，襄陽，南寧等地之條文，一似協定之事已見諸事實者。吾人姑不提及各報曾載汪先生主張日方應先撤退華南部隊而後進行和議之事以為反證，即就此所謂秘密而言，奈何不揭發於南昌失陷之前，却公布於汪先生再度宣言促請平行議和之後耶？

二、就目前戰局言，上述諸城市，確已岌岌可危，該協定中所謂限日本在五六月間完畢此程序，恐亦不幸而言中。

三、南甯西安陷落後我國必將殘馬德里肅共求和之剪轍，各路軍隊，必將公開擁汪主和。該協定中所謂汪保證至少能統制二十師，恐亦不幸而言中。

四、和議成立，南北偽組織當然取消，國民政府亦必改組。該協定中所謂汪氏推翻國民政府及要求日方廢除南京及北平偽政府而在南京成立新國民政府，時勢所趨，恐亦將見諸事實。所可恨者，誠如各報之所宣傳，日本迄今猶未肯以汪先生之真正主張為然耳。

嗚呼！所謂秘密協定，所謂賣國鐵證，雖係含沙射影之物，然非類似一江湖術士之無聊推背圖乎！